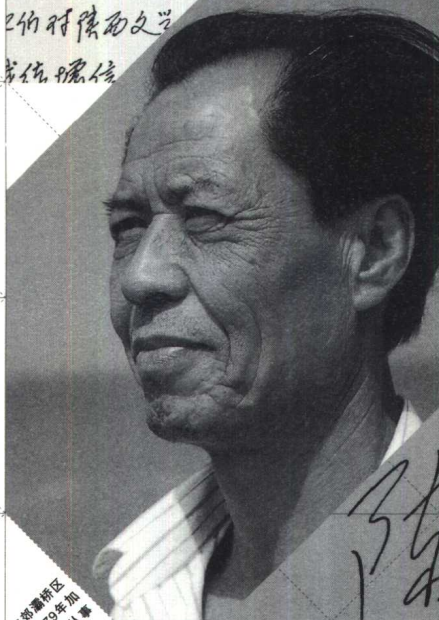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新观念到文学批评
基本的品格。因为在
力)最欠缺的就是这种坦
加诤的评说风气。尤其像我
这场纯粹属于文学论题的讨论，
这些文学圈子的那么多该正
界参与了讨论，且不说他的
20世纪中国文学
张忠义



张忠义

张忠义，男，1942年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
西蒋村。196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任陕西作协办公室主任
专业创作。现为陕西电视台主持人。

...的土壤。正是基于这样的自觉
我以逼近舞臺的警示：我在对待作
品和评说别人的作品时，请和
职业的阅读员通过各种媒
体，来建可能不是观
于因吹他吹我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陆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陈忠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3544-2

I. 陈… II. 陈…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015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责任印制:王景林

陈 忠 实

Chen Zhong Shi

陈忠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插页 4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44-2/1·2697

定价 26.60 元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三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堂庑渐大： 陈忠实过渡期小说创作状况(代序)

李建军

陈忠实早期的创作,属于随顺的平面化写作,是对生活的浮泛的表象化记录,情节解结则呈现为一切矛盾都得到化解的简单模式,缺乏批判的精神姿态,缺乏深刻的思想照临,缺乏成熟的人性视境,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宁静的性质,有杜甫笔下春夜细雨,随风而来,润物无声的意境。写小说的陈忠实有如田间老农,慢慢地细细地埋头干自己的活。他从来不疯张,不满世界语惊四座地发表自己的文学宣言和主张。他像冬日里的一株苍劲的老梅,而不是春风里舞姿婆娑的柳树。沉静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面对文学的基本姿态。他对文学有一种忠诚甚至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与文学保持着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也使他在缓慢艰难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考察陈忠实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陈忠实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自己早期创作中的种种不成熟。他已经进入了过渡期,一个连接贯通早期创作和《白鹿原》写作的重要的创作阶段。

①

堂庑渐大：
陈忠实过渡期
小说创作状况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陈忠实

②

一 云破月来：文化视境的展开

如果说，陈忠实早期的小说，是有浮泛的性质，只满足于对当下时事作表象化记录，而缺乏对文化背景的关注和叙写，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就意识到了特定的文化构成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对于人的性格、命运的影响，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制约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中篇小说《四妹子》(1986)，是陈忠实这个时期中篇小说中最有韵味的一部。它细腻而美丽，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不仅在陈忠实的所有中篇小说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是那个时期中国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部小说虽然把故事发生和延展的背景，放在一个政治上混乱得近乎荒诞的年代，划定成分和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给普通农民的家庭生活和精神世界，造成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但是，作者显然已不像他在前期阶段那样，纯粹取一个外在的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并把它作为推动情节的动力元，而是主要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展开叙述，来把握人物的命运。作者把他的同情都放在了四妹子一边，也放在了陶塑四妹子的性格、情感及行为方式的陕北文化一边。

陕北的文化，是一种并没有完全被正统儒家文化同化的文化形态。由于地处鄙远，而且人们居住较为分散，所以，就很不利于正统的儒家教化力量的渗入。陕北人的天性自由、浪漫，甚至含有一些野性、剽悍的成分，但如果说陕北人粗鄙、野蛮、没有教养，却是极大的诬枉。陕北人骨子里是善良、温和、慷慨的。他们非常自尊，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但他们更尊重别人，他们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极为温柔、敏感、细腻的情感世界。事实上，正是这种诗性的内在情愫，

赋予了他们吼唱信天游的丰富的想象力和不竭的激情。他们的生活是苦焦的。恶劣的环境、繁重的劳作,再加上这个地方长期处于汉族与北方民族交战的前线,也是官匪冲突与周旋的地带,这些因素,在陕北人身上最终凝定成一种面对苦难、死亡的坚韧、乐观、豁达的性格,当然其中也不乏听之任之、无可奈何的因素,这些因素最后积淀成陕北人性格中消极的一面:盲从、缺乏理性和对权力的缺乏节制的歌赞与膜拜。

《四妹子》叙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都在揭窳陕北的自然、浪漫性质的文化形态,与关中的方正、板直,甚至压抑得有些让人窒息的文化形态的冲突。所以,四妹子的遭遇,不仅是个人性格和命运的反映,也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关中与陕北,都鄙有章,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四妹子为了不再过苦不堪言的穷困生活,便投奔已经嫁到关中的二姑,想让她在关中为自己找一个婆家。她的愿望卑微极了,只不过是吃得再好一些,不再挨饿忍饥。小说从相亲、结婚开始,直到最后的分家,都注意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和冲突。从这些冲突中,四妹子似乎也悟出了从经济上谋求独立,才是根本出路的道理。于是,她起早贪黑地到山里去贩鸡蛋。于是,她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受批判。四妹子的大胆行为,再次让吕克俭老汉意识到了四妹子这个陕北人,这个“异类”身上存在着可怕的东西:“老汉猛然联想到‘闯王’,那个东奔西杀的李闯王就出在陕北。穷则乱世。这个自小生在吃糠咽菜的穷山沟里的三儿媳妇,自然无法养成遵规守俗的涵养了,活脱脱就是一个失事招祸的女闯王。”^①四妹子却全然不在乎,“批判”完了,她回到家里照样有滋有味地吃饭。这恰是陕

^① 《陈忠实文集》,第3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62—263页。

北人身上固有的那种忍耐、乐观、豁达的文化性格的表现。吕老八说得对,她绝不满足于吃饱饭。她还要活得自由,活得有尊严。她通过切实的努力追求着这些东西。她过去的苦难生活教给了她追求这些东西的智慧和能力。

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叙说,批判关中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性的一面,是陈忠实许多小说的一个共同倾向。《康家小院》中的吴玉贤,《蓝袍先生》中的田芳和杨龟年的二儿媳妇,还有《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小翠等许许多多不幸的女性,都是陈忠实用同情的笔墨刻画的不幸的女性形象。在《四妹子》中,陈忠实批判关中已经板结的伦理文化和关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立意,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意识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存在着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别“多半是由于自然环境形成的”^①。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陕北女子在食饱衣暖的关中活得并不自在,而“《四妹子》就是写她的人生的不自在的”^②。完全可以说,四妹子的不自在正是由关中文化与陕北文化的异质关系和强烈冲突造成的。陈忠实在一篇题为《从〈跳底子〉看关中心理结构》的文章中,探讨了关中人文化心理形成的原因。他说:“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那个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也会很快被沉没,不会产生恒久的生命力。”^③很显然,这样一

①② 《陈忠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第86页。

③ 陈忠实:《创作感受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20页。

种性质和形态的文化，与陕北的具有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的文化必然是不相融的。所以，一下子被抛进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生存环境中，四妹子的“不自在”，几乎是注定难以避免的。

如果说《四妹子》展开的文化视境是横向的、空间性的，它是把两个地理板块的文化进行横向的比较，从而对一种异化性质的文化进行深度解构，那么，《蓝袍先生》展开的文化视境则是纵向的、时间性的，它是把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板块，进行纵向的比较。如果说《四妹子》的文化批判向度是一维的，主要指向关中文化压抑人性的那一面，那么，《蓝袍先生》的文化批判向度则是双向的，它一方面指向僵硬、板滞的旧有文化、一方面也指向过于任性、癫狂、粗野的新生文化。

《蓝袍先生》中的蓝袍先生，名叫徐慎行，出生并成长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他的爷爷是清末的最末一茬秀才。由于时运不济，他在杨徐村坐馆执教。他俨然是事实上也确实是中国旧有文化的守护者。但他显然不如《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更能全面反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他过于古板。他的古板也影响到了蓝袍先生的父亲。徐慎行的父亲，是传统文化转塑出来的一个“完美”的标本。活在他身上的旧文化的那种压抑个性、翦灭生命活力的巨大而残酷的力量，令人毛骨悚然。这位父亲的古板、冰冷、僵死，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那位“装在套子里的人”，想起了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丈夫卡苏朋。他不仅外在行为怪异得让人吃惊，他的情感世界的武断和粗暴，也绝不亚于他的外在形象和留给人的印象。他严格地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来“磨练”自己的儿子徐慎行。他奉行“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压根儿不许我和村里任何女孩子在一

块玩耍,不许我听那些大人们在一起闲谈时说的男女间的酸故事”^①。他以近乎荒诞的理由,给儿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他终于把徐慎行培养成了坐馆的教书先生,终于给儿子穿上了那件象征着束缚和压抑的蓝色袍子。

解放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一种新生的文化产生了。“我”痛苦地体验着从旧文化氛围的压抑向新生文化规范归顺的裂变。新生文化改造旧有文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于是,“我”的蓝布长袍被改成了“列宁服”。这是极有象征意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走路的姿势也变了,甚至敢于“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并对她说:“我今天解放了!”

接下来,他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世界,便被新生的文化接管了。他参加排练《白毛女》。他挥起拳头对付来抢田芳的“一帮子蛮汉”。他唱《翻身歌》。他学会情不自禁地流感激的泪。他几乎一路凯歌。然而,意外的打击在等着他。父亲以死相要挟,扑灭了他要求离婚的强烈愿望。新的打击,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他。“反右”开始了。他成了“右”派。他批评班长“好大喜功”,就被戴上了“攻击党的领导”的帽子。他被送去改造。他天不明就起来打水、扫院子、扫厕所。他干最苦最累的活。“我渴望重新作为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② 在接下来的“向党交红心”的运动中,他也是痛哭流涕地把“他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但是,他依然没有获得群众的认可,“没有一个人提及我做了许多不属于我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

① 《陈忠实文集》,第3卷,第77页。

② 同上,第151页。

的那句反党言论——重新进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定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①。在这种新生文化的熬炼中,他的灵魂和精神所遭受的扭曲和伤害,绝不下于旧有文化带给他的痛苦。到最后,他的心灵,不仅没有获得解放,甚至被扭曲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尽管我退休回到家里,我的心,似乎还在那个小库房里蜷曲着,无法舒展了。田芳能够把我的蓝袍揭掉,现在却无法把我蜷曲的脊背捋抚舒展……”^②

从徐慎行的悲剧,可以看出两种文化(旧有文化与新生文化)的异形同构同质性。“异形”指其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旧有文化往往以家庭的家长权威或学校教育的主宰力量,来影响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这种文化静悄悄地宰制人的灵魂,而且不乏一种家庭伦理的温馨感,往往在不知不觉的日常氛围中,完成对人的心性和性格的转塑。换言之,这种文化以家庭为连通国家意志与个人精神的中介。而新生的文化,则是一种以人民伦理形式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和全能主义文化。它同样以强有力的方式主宰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着个人的道德行为和伦理观念,但它完全抛开了家庭这个中介环节。它一反旧有文化的那种滞缓、板直、僵硬的文化运作方式。它具有迅疾、猛烈和出人意料的特点。任何个人在这种整体化力量面前,都有一种恐惧、自卑和无助的感觉,除了极个别人,极少有人能以个体的力量和勇气,与这种整体主义文化的转塑力量相抗衡。然而,旧有文化和新生文化的这种形式上的不同,并不影响它们具有同构与同质性:这两种文化都同样蔑视个人尊严,尤其对人的情感生活、思想自由,都采取一种防御和打击的态度。徐慎行的

① 《陈忠实文集》,第3卷,第152页。

② 同上,第186页。

不幸遭遇和悲剧结局说明了这一点,无数知识分子遭受的打击和伤害,也说明了这一点。陈忠实《蓝袍先生》所敞亮的文化视境,正是因为有助于我们形成这种认识,才标志着他的创作已经实现了堂庑渐大,视境渐趋宏阔、深远的可喜跃迁,进入了通向《白鹿原》创作的先期准备阶段。

二 水落石出:裸程人的生存境况

过去我们总是笼统地说“文学是人学”。这固然没有错。这个命题对那种无视文学的人学性质,试图用偏狭的政治实用主义尺度要求文学的观念,尤其具有摧陷廓清之作用。但是,倘若要想进一步弄清文学与人的更深在、更密切的关联,这个简单的命题显然还不能说明问题。倘若要更进一解,我们应该指出,文学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处于苦难、不幸、逆境中的人的命运。它寻求从精神上、灵魂上抱慰人、乃至拯救人的路径。正像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是艺术创作中最占优势的问题。”^① 丹尼尔·贝尔也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realm of meanings)。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人类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② 这就是说,文学和艺术都要有宗教的悲剧的精神,要像宗教那样关怀人,要充满从苦难与不幸中拯救人类的深切的焦虑和不竭的激情。

①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第79页。

②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79页。

如果说,陈忠实早期的小说,还只停留在对外在的事件和无关宏旨的矛盾冲突的反映上,那么,到了过渡期,他已把自己的视点转向人性、人的苦难命运、人的不幸遭遇这一层面了。这种转变,对他来讲,是巨大的,说明他已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用自己的思想来理解、把握、叙述真正人的生活,而不再是记录外在的生活表象。真正的人,在陈忠实过渡期的小说中,虽然睡眠惺忪,衣着凌乱,步态蹒跚,比起《白鹿原》中的人物,这个时期小说中的人物未必个个都那么像真正的活人,未必都有圆整的性格,未必都向我们打开了关于人的命运的深在的意义空间,但他们确实都影影绰绰地以人的面目出现了。

怀着诚挚的深情,关注农民的生活,在小说中叙说农民的遭遇和命运,是陈忠实小说的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主题,是陈忠实文学创作的一个化释不开、丢放不下的情结。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后来他虽然在公社当干部,上下于官民之间,虽然住进了都市,往返于城乡地带,但他对农民生存境况的关注之情,却一点也没有变。虽然在前期小说中,农民生活的真实相况,由于他的热衷于以揄扬的态度从时代政治的外视点来展开叙述,而没有得到真实而充分的展现,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的叙述明显有了变化。他取下了只能看到莺歌燕舞的有色眼镜,切切实实地审视农民的艰辛、困苦的生活,叙说他们的命运和遭遇。《最后一次收获》就是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作品。

这部中篇小说注意营造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那种诗性氛围,美丽的自然风光,美好的爱情故事,都为小说增加了亮点,但作者的这种努力,显然并不是为了用以美化农民的生活的困苦,而是为了给人一种更加复杂和沉重的感受。一个即将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城里的工程师回到农村家里,最后一次去收获成熟的小麦。作者从一个已经成为城里人的农家子弟的角度展开

叙述,显然是为了营构强烈的对比,为了显示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为了显示农民生存的不易。沉重的劳动,原始的劳作方式从形体上扭曲了农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的男人,十之八九都变成了罗圈腿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长着两条端直的腿,几十年从坡上拉下沉重的小推车来,腿不能硬直着走路,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长长的双腿朝外弯曲了,变形了,变成适宜于山坡上拉载重负的罗圈腿了!”^①中国农民的近乎原始的劳动方式,扭曲的不仅是人的形体,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因此受到压抑和扭曲:“……疲劳完全抑制了人的智慧,沉重的劳动使他的脑子骤然变得单纯而近乎于愚蠢了。”^②小说中的工程师赵鹏同时感受着两种生活,只有他才能把都市与农村生活进行比较,才能看到农民生活的艰辛程度,看到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异。陈忠实通过这种比较,把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展示了出来。农村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长期的极“左”农业政策“又造成了农民粮缸和钱袋的空虚”^③,青年农民苍娃用借来的钱偷偷买粮,却被守在渭河大桥的民兵抓获,粮食全部没收了,他哭着跪下来,向守桥的民兵求情。这样的场面描写和情节叙述,记录中国农民在某一历史时期真实的生活状况,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这篇小说有白居易的《观刈麦》的悯农精神,它留给人的是沉重而酸楚的回味,引发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把农民从这种异化性的生存境况中彻底解救出来?

在这个时期,陈忠实不仅从同情的角度,关注农民的不幸,而且还从批判的角度,审视、剖析农民身上的劣根性,省思农民的生存境况,从而提出与农民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舔碗》是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作品中的讽刺技

①②③ 《陈忠实文集》,第3卷,第19页,第27页,第48页。

巧,也是极成熟、老到的,作者自己的过于凸显的评价性话语消减得恰到好处,作者更注重用对动作行为的描写,来显示自己对人物的评价和态度。这篇小说与《白鹿原》第六章的内容是相近的。只不过《舔碗》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叙述得更为充分,而在《白鹿原》中则较为省净、节制。黑娃的主家黄掌柜有个习惯:吃完了饭要舔碗。这是他家几辈人代代相传的一种习惯。故事的情节发展的驱动力,就是黄掌柜要黑娃也舔碗,黑娃不舔,他就苦口婆心地对他讲舔碗的好处。他说,他家的家业都是舔碗舔出来的。黑娃实在不习惯,一舔就吐。于是,他就不让他再舔了。但黑娃舔碗事业的失败,却把黄掌柜给折磨病了。黑娃于心不忍,便支支吾吾地说:“要是舔了碗能除你的病,那我就……舔。”黄掌柜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双手抓住站在炕边的黑娃的胳膊,颤抖着厚长的下嘴唇说:“黑娃你要是舔碗就把我救下了!”^①但黑娃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舌头一挨碗就恶心,一舔就吐。后来,黄掌柜对他绝望了。他亲自舔黑娃吃过饭的碗。但这还是让黑娃恶心。后来情况严重到黑娃看到黄掌柜吃饭时伸出来的舌头就反胃,就想吐,甚而至于一看见碗,一看见黄掌柜的厚嘴唇,也有同样很强烈的感觉。到最后,黑娃在夜里逃走了,“俩月的工价粮食自然就是不敢索要的”。

圆熟的讽刺技巧,深刻的人性开掘,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调,以及契诃夫小说的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力量,都使这个短篇小说有了某种经典的意味。它让人认识到落后的生活方式,在农民心灵上造成的扭曲有多么严重。黄掌柜的舔碗,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勤俭持家的问题,而是与人的生存的精神状况相关的问题。周作人先生批评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

□□

堂虎渐大:
陈忠实过渡期
小说创作状况

^① 《陈忠实文集》,第5卷,第159页。

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进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①。黄掌柜的舔碗,无疑也属于一种变态的行为,一种“畸形的道德”,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先生,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是不宜加以“提倡”或“赏赞”的。然而,这种境况的形成,确亦有其不难理解的外在原因。正是由于物质贫困和没有开化,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滞留在极为粗鄙、原始的层面。在这里,还谈不到高尚的趣味,谈不到优雅的举止,谈不到文明的教养。那些极为丑陋的习惯,使他们的许多行为,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但是,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尊严感的麻木,才使他们对种种丑陋的习惯,恬不为怪,缺乏自觉。极而言之,生活还有一个内在的精神向度,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知道区分什么是丑,什么是美,什么是粗俗,什么是高雅。对这个精神向度的生活缺乏自觉,恰是中国农民(也许还不仅仅是农民)生存境况恶劣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与农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这也许就是陈忠实这篇小说敞亮给我们的启示。

三 朗畅激越:语言风格的变化

语言是小说的表达媒介,是小说的承载形式,离开语言,就没有小说这个艺术,就像离开语言,我们就无法讨论一首诗、一篇散文一样。罗杰·福勒说:“一位作家的技巧,说到底,总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小说的结构以及小说传达的一切都是靠小说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2月。

家熟练地操作语言来实现的,同时,也是靠读者富于再创作的同情心,和根据作者所安排的语言线索发现并解放技巧的欲望和能力来实现的。”^① 福勒之言,诚为的论。从语言角度分析小说家创作的流变,确实是一个可取的路径。

陈忠实早期小说语言的一般风格特征,是比较质实、硬气,一句话比较长,而且往往也比较密,常常是由好多个逗号隔开的简单句子构组成的。很少用比喻,也极少用夸张,叙述倾向于直陈其事,描写则倾向于直写其形,很少浓墨重彩,层层叠加地去展开描写。从消极一面看,他早期小说的语言,似乎缺乏小孩涉过浅溪的那种轻灵跳脱的活泼感,倒像一个步态徐缓艰难的老者携幼孙行路,过于小心翼翼。这就使他的语言常常给人一种滞重、沉闷、单调的印象。他似乎更倾向于告诉读者,他要说的事情,他要描写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把你引领到一个宏阔的想象空间,暗示你他所叙写的东西像什么。陈忠实的质实,求真,使他倾向于直写,而不是选择那种思致微渺的诗性的曲写。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② 这是中国诗追求的境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为自己追求诗境所悬的鹄的。在《红楼梦》中你可以看到这种冥漠恍惚之境。在陕西的作家中,贾平凹是喜欢这种诗性的曲笔写法的,他拟仿明清小说的语言,每有空灵玄幻之境,但也往往失之于空疏和偏枯。陈忠实追求史的质实。他明白自己的这种追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他不追求语言的空

^① 罗杰·福勒:《语言学与小说》,於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② 《原诗》卷二《内篇》下。